

【특 집】

近代關內移民与中國東北區域文化的變遷

范立君*

丨 차 례 丨

1. “全部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近代关内移民东北概观
2. 同化与异化：移民与东北区域文化的变迁
 - 1) 移民与东北区域文化变异的关系
 - 2) 移民与东北区域语言文字的变迁
3. “新型关东文化”：东北地区的移民文化特征
 - 1) 兼收并蓄、宽容大度、绝少排他性
 - 2) 东北社会没有建立起典型的传统伦理关系网络，人们的血缘观念淡漠，家族性弱化
 - 3) 文化上的进取性与保守性并存

국문초록

近代 이후 關內的 중국인이 중국 동북지역(만주)으로 대대적으로 이주했는데, 이는 동북지역의 문화에 많은 변화를 촉진시켰다. 한편 漢族의 문화는 동북의 少数民族에게 전파되었고 토착민족에 의하여 수용되었다. 이로써 만주족을 위주로 한 토착문화가 점차 한족 문화에 동화되기 시작했다. 다른 한편 漢民族의 전통문화에도 변화가 나타나기 시작했다. 이처럼 동북의 문화가 일종의 다원적인 문화적 형태를 띠게 되면서, 원래의 “民族”을 위주로 한 문화적 특색이 “地方”을 중심으로 한 문화적 특색으로 전환되었다. 또한 각각의 민족적 특성을 기반으로 상호간에 자각적인 융합과 우월적 특성화가 이루어졌다. 이러한 기초에서 동북문화는 關東지역과는 달라

* 中国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졌고 중원 지역과 일치하지 않는, 동북지역 특유의 이민 특성을 지닌 문화적 형태, 즉 “새로운 유형의 關東文化”를 형성하게 되었다. 이것은 동북 지역의 문화로 하여금 민족적 특징에서 지방적 특징으로 분명히 전화될 수 있도록 해주었다.

주제어: 近代, 關內移民, 區域文化, 변이, 민족성, 지방성

近代以来, 关内人口¹⁾向东北的迁移, 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 它对东北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 东北移民问题, 历来是人口史、社会史领域一个值得注意的重大问题。关于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初即已发端,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 学者们大多还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上, 对移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尤其是与区域文化变迁的关系尚缺少深入的探讨。为此, 本文转换视角, 从文化学和民族学的角度, 对移民与东北区域文化变迁的关系作一考察, 以补充、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

1. “全部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近代关内移民东北概观

清代以前, 东北地区人烟稀少, 荒野未辟。1644年(顺治元年)²⁾, 多尔袞率八旗兵入关, 攻取北京, 为了便于加强对全国的统治, 清廷决定迁都北京, 这次大规模的迁徙, 据后人推算总人口当在90万人以上³⁾。这么大规模的人口“从龙入

1) 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 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

2) 由于本叙事侧重于近代, 故在纪年的使用上以公元纪年为主线, 涉及清代的, 辅之以王朝纪年。下同。

3) 参见韩光辉: 《北京历史人口地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72页; 傅乐焕: 《关于清代满族的几个问题》, 《辽史丛考》, 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408页; 张毓如: 《清初封禁与招民开垦》, 《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第186页。

关，尽族西迁”，造成了辽沈地区人口锐减，除盛京和锦州几处有少量兵丁留守外，辽沈大地一时是野无农夫，路无商贾，“土旷人稀，生计凋敝”⁴⁾。这使本来就人烟稀少的东北地区变得更为荒凉。与此同时，关内战争犹酣，土荒丁亡，财尽民穷。为了恢复农业生产，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正式向全国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以破格奖励和优待的办法，鼓励关内人民出关开垦。在招垦优厚条件下，燕齐穷困之民，闻风踵至，“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⁵⁾，成群结队出关觅食。辽东招垦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复苏，荒芜的土地得到垦殖，人口增加，民户增多，对医治战争创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就在辽东招垦初见成效，大量移民涌入“龙兴之地”时，清廷出于保护对人参、东珠、黄金等资源的垄断，维护旗人生计，保持满族固有的尚武精神，防止汉、蒙民族结合，威胁清朝统治等目的，1668年(康熙七年)，废止了行之有年的辽东招垦令⁶⁾。对关内到东北的移民，实行“事先起票，过关记档，只身放行”的消极限制措施。而对已经进入东北的汉民，强令其取保入籍。不愿入籍者，限期十年，勒令回籍。到乾隆时，清廷对东北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封禁政策，坚决禁止汉族移民入境。

乾隆朝开始实行的东北封禁政策，为后来的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所遵奉。然而，绝对的封禁从来没有实行过，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越来越多的山东和直隶等省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东，或私越长城走辽

4)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6，民政奉天省，长白丛书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923页。

5) 刘爽：民国《吉林新志》，长白丛书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16页

6) 关于辽东招垦令废止的原因，清廷没有明确的谕令，学界对此多有探讨。多数学者认为，《辽东招民开垦条例》的取消，实际上是对东北封禁的开始，只是当时执行并不严格。少数学者则认为，废除招垦令之举，只是罢除授官之例，并没有禁止招民开垦，因而不同意辽东招垦令的废除即为封禁东北之始的说法。参见张旋如：《初封禁与招开垦》《社会科学战线198年期，1818)、温顺德：《清代乾嘉时期关内汉人流移东北之研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研究199年硕士学位论文，1)等

西。仅康熙末年，山东到关外垦地者已多至十几万人⁷⁾。据统计，到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时，奉天地区移民人口及后裔有90万左右，吉林地区有30万，黑龙江地区约有11万，东北地区的移民人数总计约有131万⁸⁾。

咸丰末年，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下，终于废除封禁政策，开始主动向东北移民。1904年(光绪三十年)，东三省全面开禁，此后关内向东北移民出现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次高潮。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人民，闻风而动，“纷至沓来”，出关人数“日难数计”⁹⁾。据1910年(宣统二年)统计，仅山东一省人民“每年春融之期，结队入东省……数额颇巨，殆有络绎不绝之势”，每年从烟台、登州、龙口到达东北者“合计共达三十五六万人之谱”¹⁰⁾。那么，清代200多年间，迁入东北的移民数量究竟有多少？历史上没有确切记载。中国著名地理学家、人口学家胡焕庸曾说：东北三省人口增长史，显示着冀鲁豫三省人口外移的过程¹¹⁾。因此，我们可以从东北人口的增长来推断移民的数量。

7) 圣祖仁皇帝实录》25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庚子中华书局1985年影第478页。

8)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清 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483页

9) 《论山东难民多往奉锦二府事》，《申报》，光绪二年八月廿四日，第1版。

10) 《盛京时报》，宣统二年三月五日。

11) 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8年版，1

<表 1> 1753~1911年全国和东北人口数量表(单位:万人)

年 代	全 国	东 北	奉 天	吉 林	黑 龙 江
1753年(乾隆十八年)	10,275	22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	19,034	42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	20,047	67			
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	20,983	71			
1786~1791年(乾隆五十一至五十六年) 平均	29,699	97	82	15	
1812年(嘉庆十七年)	36,169	124	94	30	
1830~1839年(道光十至十九年) 平均	40,322	248	216	32	
1840~1850年(道光二十至三十年)	42,126	373	241	32	
1851年(咸丰元年)	43,189	290	258	32	
1862年(同治元年)	25,541	316	283	33	
1871年(同治十年)	27,531	330	297	33	
1881年(光绪七年)	31,247	455	421	34	
1891年(光绪十七年)	34,109	551	462	55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36,144	542	464	78	
1911年(宣统三年)	36,815	1841	1102	554	186

资料来源: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58、262~265、269页制成。

由上表可见,东北人口,从1753年的22万人,不到60年就增长到124万人,以后不到80年就超过500万,从1891年到1911年不到20年就从500余万陡增到1,841万,显然主要是由于移民的结果。据估算,在这1,841万人口中,关内移民至少有1千万¹²⁾,这是东北地区人口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另据台湾学者赵中学综合各种数据,从中得出关于东北移民最低的统计数字,即从1661年(顺治十八年)到1908年(光绪三十四)约250年间,东三省的汉族移民从5,000人增加到1,445万¹³⁾。即使这些人口数字偏低,我们也能够看出移民对于清代东三省人口增长的巨大贡献。

12) 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13) 赵中学:《近世东三省研究论文集》,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14页。

中华民国成立后,这种移民的势头有增无减,持续增大,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¹⁴⁾。20世纪20年代是关内移民东北的高峰期,史料记载称之为“移民的狂潮”¹⁵⁾。“九·一八”事变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曾派人赴东三省进行实地调查,在被调查的1,149户移民家庭中,其离村时期“有10%,是在光绪四年(1878)至宣统三年(1911)之间,有90%,是在民元(1912)至民十九年(1930)之间”,其中20年代的移民占了民元以来移民的1/2以上¹⁶⁾。尤其是1923至1930年的7年间,移民人数逐年增加,持续增大,至“九·一八”事变前达到了顶峰。“来东北谋生者,其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难民多”¹⁷⁾。《海矣十年报告》记载说:“多少世代以来,都有向满洲移民的——在19世纪70年代的大饥荒中,移民数量相当大——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的规模”¹⁸⁾。

此间迁来之人口,“络绎于途,势如泉涌,南满铁路以及吉长铁路搭载之旅客数目,剧烈增长,殊为空前未有之现象”¹⁹⁾。据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委员会统计,1923~1930年,关内移赴东北者约500余万人,其中1923年移入的人数为342,038人,1924年为376,613人,1925年为491,949人,1926年为572,648人,至1927年移民人数剧增,突破百万,1928、1929两年仍维持在百万以上。1930年移民人数(810,000人)稍减,但仍超过了1927年前的历年移入数。若以1923年的人口指数为100,则1924~1930年的人口增长指数分别为:110, 144, 167, 297, 330, 316, 237²⁰⁾。1927年是民国时期东北移民关键的一年,是年“山东、直隶、河南的人民,受

14) 《海矣十年报告》(1922~1931)第1卷,第25页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38页。

15) 《海矣十年报告》(1922~1931)第1卷,第25页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38页。

16) 王药雨:《山农民离村的一个检》,天津大公》1932日,第11版。

17) [日]满铁庶务部调查课:《民国十七年の满洲出稼者》,1929年日文版,第129页

18) 《海矣十年报告》(1921931)第1卷,第25页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38页。

19) 1927年之移民与东省铁),东省经济月》第3卷第3号192年,第27页。

20) [日]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委员会:《满洲に於る支那移民に於する数的研究》,大连,1931年日

了荒歉和兵匪之灾，痛苦已极，不得不逃亡东北，图谋生活，东北入境的移民人数，突然增多，为以前所未有”²¹⁾。据满铁人事课劳务股调查统计，从1927年开始，关内人口流向东北的人数，由1926年的50多万人猛增至100多万人，并且持续3年之久²²⁾。“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方问题研究会编写了《东北事件》一书，书中也有类似记载，“据统计家调查，民国十六年中国内地移往东北的人民约120万；民国十七年约110余万；民国十八年约130万”²³⁾。

以上这些调查统计数字虽不尽一致，略有出入，但足以说明，“九一八”事变前关内人口向东北迁移，自1923年开始逐渐加大，至1927年达到顶峰，出现了近代以来关内向东北移民的第二次高潮。这次移民高潮，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呈现出逐年递增之势。

文版，第6页。

21) 朱家骅：《浙江移民问题》，1931年版，第19～20页。

22) 东北文化社编印处：民国二十《东北年鉴》，沈阳：东北文化193年版，127页

23) 《东北事件》，第294页，转引自朱玉湘等：《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179页。

<表 2> 1912~1949年关内移民东北人数统计表(单位：万人)

年份	迁入数	回返数	定居数	年份	迁入数	回返数	定居数
1912	25.2	8.0	17.2	1931	46.7	40.8	5.9
1913	26.0	8.0	18.0	1932	41.4	44.9	-3.5
1914	27.2	8.4	18.8	1933	63.1	44.8	18.3
1915	28.0	10.0	18.0	1934	69.0	43.9	25.1
1916	25.9	6.0	19.9	1935	51.9	49.5	2.4
1917	30.4	8.5	21.9	1936	43.6	45.2	-1.6
1918	27.2	12.0	15.2	1937	32.0	25.0	7.0
1919	33.0	11.0	22.0	1938	49.2	19.2	30.0
1920	33.6	11.5	22.1	1939	81.0	31.2	49.8
1921	36.2	13.2	23.0	1940	105.0	65.0	40.0
1922	36.8	13.4	23.4	1941	92.0	56.0	36.0
1923	34.1	24.0	10.1	1942	95.0	47.0	48.0
1924	38.4	20.0	18.4	1943	93.0	52.4	40.6
1925	47.2	23.7	23.5	1944	60.0	28.3	31.7
1926	56.6	32.3	24.3	1945	40.0	25.1	14.9
1927	105	34.1	70.9	1946	38.0	36.0	2.0
1928	108	57.8	51.1	1947	35.0	41.0	-6.0
1929	104	62.0	42.0	1948	25.0	35.0	-10.0
1930	74.8	51.2	23.6	1949	24.0	38.0	-14.0
小计	899	305	594	总计	1983.9	1073.3	910.6

资料来源：据杨子惠：《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7~1409页制成。

上表是《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综合各种统计资料制成的民国时期关内移民数量表。表中显示，1912~1949年历年进入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数量多少不一，但最少也在20万以上，其中有4个年份(1927、1928、1929、1940)的移民数超过了100万人。整个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移民总数为1983.9万人，其中在东北定居的为910.6万，定居率为85%，诚可谓“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举”²⁴⁾。

24) [美]Walter Young：《美报之华人满洲移民运动观》，《东方杂志》第25卷第24号，1928年，第49页。

2. 同化与异化：移民与东北区域文化的变迁

关于移民与社会变迁的关系，1928年朱倏先生撰写了《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一文，认为关内向东三省移民，于中国前途之影响有五：1、解决民食问题，减少内乱之原(源)；2、解决人口问题，使内地各省不致有人口过剩之患；3、为中国民族向北发展之一新纪元——移民结果，可使东三省完全中国化；4、开垦荒地，启发利源；5、增加中国在满洲之势力，以御外侮而防侵略——进一步言之，可以强固东北之边防，而拱卫中原²⁵⁾。上述几点，都应引起注意，其中第三点虽带有某种偏见，但也说明了大批汉族移民的迁入，促进了汉民族同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进一步密切了中原与东北地区的关系，缩短了内地与东北之间的差距，使东三省完全“中国化”，而这一切是通过移民与当地土著民族在文化上的碰撞与交融完成的。

1) 移民与東北區域文化變異的關係

“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由人类创造的，也是依附于人类而存在的，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多样性使文化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表现出强烈的地理特征”。同时，人又是文化的载体，当人口迁移时，他们所具有的价值取向、生产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也必然随之移动，因而，“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所以说，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²⁶⁾。因此，移民现象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人口迁移不仅引起文化诸要素在空间上的转移，也必然导致在植入区域中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其结果便是某种新型文化的出现，这是移民与区域文化间复杂关系的核心所在。清末以来，东北地区的移民活动异常频繁，这种壮观的大范

25) 朱倏：《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1928年，第21页。

26)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卷(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围的移民现象，其在文化上的影响是相当巨大而深远的。因此探讨移民活动对东北区域文化产生的影响，便成为探讨移民与社会变迁关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英国文化学家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既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征，又具有流动变异性的特征。前者使一种文化与他种文化相区别，后者又使文化之间有沟通性²⁷⁾。近代以来，关内人口大规模迁往东北，使东北区域文化发生了变异，就说明了这一点。就移民与东北区域文化的关系而言，笔者认为，这种变异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汉族文化在东北少数民族中传播，被土著民族所接受，以满族为主体的土著文化逐渐被同化。

清末民初，随着关内移民大规模出关谋生，东北人口的民族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汉族已成为东北人口的主体。1931年有人估计，“今日三千万之东北人民，汉族实居百分之八十以上”²⁸⁾。当大批汉族移民深入到东北少数民族的腹地时，不仅带来了关内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也把自己的语言、出生地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带到东北，并在文化层面上对东北土著民族进行了重新塑造。这样，中原文化逐渐渗透到东北各地，造成了中原文化对以满族为主体的土著文化的同化局面。时人评论道：“山东农夫，跋涉长途，开垦荒地，有探险之性，具沉毅之力，其质朴敦厚之风，关内农民，不能过也。至于移风易俗，使东北完全汉化，厥功尤伟”²⁹⁾。至“九·一八”事变前，满人“起居、饮食、衣服、言语，均与汉人同化。间有拘守旧俗者，殊不足左右习尚，将来满人与汉人同化，可断言也”³⁰⁾。

可见，关东土著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包围之下，只能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向中原文化看齐³¹⁾，最终导致东北土著民族“渐效华风”³²⁾。整个东北，“无论在语言、宗教

27) [英]马林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3页

28) 胡伯玄：《东北四省之建置历史与民族源流》，《新亚细亚》第3卷第5期，1932年，转引自孙东虎：《清代以来东北地区民族构成及地名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5期，第205页。

29) 黄泽苍编：《山东》，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12页

30) 伯勤：《黑龙江沿岸一瞥》，《中东经济月刊》第7卷第4、5合号，1931年5月，第199页

31) 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32) 郑士纯等修、朱衣点等纂民国《桦川县志卷5台成文出版有限公197年影印706页

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³³⁾。当时的调查资料指出：“汉人之文化程度比较高上，故其在边地之经济生活上亦占优势，久而久之，满人与达呼儿(达斡尔)在言语、服饰、建筑上均为之同。故现在欲分别谁为汉人，谁为满人，谁为达呼儿，甚觉困难，所有地方居民，就其外表言，宛然一民族也”³⁴⁾。赵中孚先生亦指出：“最主要的，在主观意义上，移民社会的广大成员并不因地理距离而自觉有别于故乡同胞……相对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当你同一个在黑龙江已经居留两代以上的山东农民交谈，你会发现，除了轻微的乡音变化外，在感情和意识上，他仍旧是山东人。部分移居东三省的人，在离开家乡后，也常把籍贯区别为‘山东济南’，或‘河北保定’之类的。这说明一个事实，对大多数东三省移民社会的成员来说，‘东三省’或‘东北’是一个行政和地区区分的标志，是抽象的。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才是真实永恒的存在”³⁵⁾。随着汉族人口占有绝对多数地位的形成，汉族的传统文化已占据了东北文化的主导地位。当时有学者即指出：“满洲人口，汉人最多，文字、言语、风俗、习惯，完全为汉人的，尤其是山东人的”³⁶⁾。

其二，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出现了变异。

在谈到移民与东北区域文化变迁的关系时，以往论者往往不适当地单方面强调汉族移民对东北土著文化的影响，而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影响的一面。殊不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来都是双向的，因而影响也是互相的。同化虽是文化的融合，但“本质上不能等同于文化交流，相对对等、双向互动才是文化交流的本质，同化顶多算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³⁷⁾。我们承认中原文化对关东土著文化的

33) 赵中孚：《近世东三省研究论文集》，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32页。

34) 《黑河调查详志》，《东省经济月刊》第5卷第12号，1929年12月，第30页。

35) 赵中孚：《近世东三省研究论文集》，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69～170页。

36) 刁泥梅：《汉人移居“满洲国”之各种情形》，《中东半月刊》第3卷第9号，1932年，第20页。

37) 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影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关东土著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尽管“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³⁸⁾，但中原文化并非也随移民而被简单地“复制”到东北，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由于“脱离母体和环境的改变，不能不发生异变……这就使复制到关东的中原文化与母体文化逐渐拉开距离”³⁹⁾。关东土著文化也不可能毫无保留的被全盘同化，在汉族移民改变东北地区文化面貌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在不同程度上被打上了当地固有文明之烙印。东北是满族的发祥地，在这里，满族文化的影响尤为明显。关内的汉人，来到东北以后，往往“再世以后，与满洲人同化矣”⁴⁰⁾。这说明，民族之间的融合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或同化，而是双向的，是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与交流。

东北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汉、满、蒙古、朝鲜、达斡尔、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早就在此劳动生息。这种民族杂居的局面，促进了东北各族的文化交流。首先是来自关内的汉族，带来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如胶东文化、豫东文化、晋南文化、江浙文化、两湖文化等等，在这里交汇融合；其次是散居各地的汉族分别吸收了东北各族的文化，土著文化的合理性和中原文化的先进性相辅相承，融铸汇合，使两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都发生变异，正是这种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交融，使东北地区，既接受汉族农耕文化，又保持自己独有的地区特色。这样，一种新型的富有移民特色的文化形态，即“新型关东文化”逐渐形成。这种文化虽以汉文化为主，但仍包含有各族文化的因素，所谓“满汉旧俗不同，久经同化，多已相类。现有习俗，或导源于满，或移

38) 赵中学：《近世东三省研究论文集》，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32页。

39) 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40)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纂：民国《奉天通志》卷99，礼俗3，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2280页。

植于汉”⁴¹⁾，这是东北各民族长期文化交流的最终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移民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也是文化的开创者和传播者。

2) 移民与東北區域語言文字的變遷

汉族移民的进入导致东北区域文化发生变异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这里以东北地区语言文字的变迁为例，来说明移民文化与关东土著文化相互冲突、碰撞、吸收、融合的过程，从中透析移民与东北文化变迁的关系⁴²⁾。

清代以满族入主中原，满语自然受到朝廷的特别推重，满语作为官方语言占有重要地位，是东北地区通用的语言。如前所述，为了保护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清朝统治者对东北封禁长达200年之久。封禁东北的原因之一，是为保存满洲的固有风俗，保证自己统治全国的根本力量，维护本民族特征，而旧有风俗的核心内容是“国语骑射”。这里的“国语”即“满语”，因在清代，故又叫“清语”。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满语文的学习和使用，对满洲故地东三省的要求尤为严格。为保存满语旧习，统治者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限制满族人学习汉语、改用汉姓，但总的看，成效甚微。随着时间的推移，满语日渐衰微下去，最终造成了东北地区由以满语为主，向汉语为主的转变。满语衰落的原因之一，即为关内大量汉人的进入。有学者指出，“当发展水平和交际功能不等同的两种语言并存于一个社会中时，发展水平较低，交际功能受到限制的语言就有可能停滞不前，经历一段短暂的双语使用期后，逐渐丧失作为全民族交际工具的地位，完全让位于发展水平较高，交际功能较强的语言”⁴³⁾。大量汉人进入东北，和满族形成杂居之势，对东北满族的汉化，无疑是一种催化剂。在长期与汉

41)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纂：民国《奉天通志》卷98，礼俗2，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2256页。

42) 由于汉族移民与东北土著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在满汉之间进行的，所以，以下内容主要以满汉为例。

43) 景体渭等：《试论东北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双语现象》，《松江学刊》2000年第6期，第26～27页。

族杂居共处的过程中，满汉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满族的固有文化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冲击，影响涉及生活习俗、经济方式、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作为满族文化典型标志和重要载体的满语在与广大汉族的交往中，明显处于劣势，最终被汉语融合替代、几近消亡。正如嘉庆帝所说，八旗满洲所以清语生疏，在于“平日屯居，该处汉人居多，故未谙清语”⁴⁴⁾。

东三省满语的衰微，大致始于乾隆朝。此后日见明显，特别是咸丰以后，随着封禁政策的废除，关内人民携眷出关者，日益增多。东三省官员不断奏报各地“生齿日繁，旗民杂处”，满族人要学习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就必须学习汉族的语言文字。他们“以少数地位在汉族人海中生活，各方面都须依靠汉人，和汉人打交接，便不能不习用汉语汉文，从而满文满语就不能不渐次被放弃”⁴⁵⁾。而满族官员要管理东三省事务，处理旗民交涉事件，就不能不通汉语。“除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以外，还必须有民族间的一种共同语言——这是为了交际的便利”⁴⁶⁾。于是，随着大量汉族的移入，“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⁴⁷⁾。诚如《吉林新志》所云：“乾嘉而后，汉人移居渐多，虽乡曲之满人，亦习汉语，今则操满语者已阙无其人矣。惟东北沿松花江下流及乌苏里江各地，未尽汉化之满族支裔，则间尚保存其固有之语言耳”⁴⁸⁾。

东北满族语言文字的废弃经历了一个由南向北的过程：盛京地区最早，吉林地区次之，黑龙江地区最晚，这个过程与移民的进程是一致的，也是汉族文化影响在日益加深，由近及远，逐步北上的过程。如今，除黑龙江省某些边远乡村，如爱辉、富裕等地，由于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满族居住地集中，汉族进入时间

44)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113，嘉庆八年五月壬寅，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501页。

45) 吕振：《中国民族简史》三联书195年，第67页

46)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年，第300页。以上转梁志忠：《清代东北满族“国语骑射”的保存与衰微》，《满族研究》1987年第3期，第76页

47) (清)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6，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48) 刘爽：民国《吉林新志》，长白丛书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较晚等因素，少数老年人还会说满语外，其他地方的满族一般都通用汉语、汉文了。因而，随着汉族人口的迁入，东北地区的语言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发展至今，大体上东北各族都已接受了汉语作为各族交流的通用语，有些民族甚至抛弃了本民族的固有语言，汉语已成为各民族的通用语，全新的语言地理格局已经形成。

在满族逐步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改说汉语的同时，满语的文化走向并不是消失了或者被汉语所取代了。作为满族的集聚地，东北是满语通行时间最长的地方，因而，满语对汉语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和广泛的，并不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这里(东北)不发生移民与土著语言相互取代或融合的问题，而纯粹是占据和填补，由河北和山东方言去填补东北的空地”⁴⁹⁾。这种论断未免过于简单、武断。语言相互间的影响，最集中体现在词汇方面。在满汉人民长期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汉语吸收了大量的满语词语。至今在汉语中，特别是在东北方言中，还活跃着许多满语词汇。这在相声、小品、小说、戏剧和影视等文学艺术作品中经常可以听到、见到。民国《奉天通志》即记载了很多这类词语，这里择取几例，以见一斑。

“瘳”(shèn)，吓、使人惊恐害怕之意：屋子这么黑，怪~人的；

“秃鲁”(tū lu)，表示做事不履行，约不践言：定下来的事，就不能让它~；

“喇忽”(lǎ hu)，指遇事疏忽：他这人总是喇喇忽忽的，太不认真了；

“哈拉”(hā la)，指油一类的东西长期存放，或存放不当而变质，并有一种难闻的气味：这油放多长时间了，怎么有一股~味儿呢；

“特勒”(tě le)，指衣冠不整：这个人也真够~，衣服脏成这样，也不知道洗一洗⁵⁰⁾。

49) 周振鹤：《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历史地理》第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50) 以上所列词汇参见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民国《奉天通志》卷110，方言，沈阳古旧书店

除了上述这些口头词汇外，现在东北地区的地名、山名、水名中仍保留着大量的满语词汇。据统计，仅吉林地区的满语地名就有五六百个，至于整个东三省就更多了。如：

“吉林”，吉林省松花江上游边陲重镇，满语“吉林乌拉”的简称，“吉林，沿江之谓；乌拉，大川之谓”，吉林市即为沿江之市⁵¹⁾；

“哈尔滨”，黑龙江省省会，满语意为“晒渔网的场子”；

“齐齐哈尔”，黑龙江省一主要城市名，满语意为“天然牧场”；

“南杂木”，辽宁省抚顺境内镇名，满语意为“刺梅果”；

“马塘沟”，辽宁省抚顺境内镇名，满语意为“鼓起的丘陡地”⁵²⁾等等。以满语作名字的山脉、河流，如：

“长白山”，满语为“果勒敏珊延阿林”，“果勒敏”汉译意为“长”，“珊延”汉译意为“白”，阿林汉译意为“山”；

“黑龙江”，满语为“萨哈连乌拉”，“萨哈连”汉译意为“黑”，“乌拉”汉译意为“水”⁵³⁾；

“图们江”，汉意为“万水之源”；

“松花江”，满语为“松阿里乌拉”，汉意为“天河”；

“牡丹江”，满语的音译，意为“弯曲的江”⁵⁴⁾等等。

可见，随着满汉民族的不断融合，汉语言中尚有许多满语的遗存，汉语吸收满语词汇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范围上都是十分可观的，作为方言、地名，满语的一部分词语被保留了下来，被东北各族人民所接受，成为东北各族人民日常交际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词语。这使得满语原来以民族为主的文化特征转化成以地

1983年影印版，第2290~2317页。文中例句为笔者所造。

51) 魏声和：民国《吉林地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52) 许皓光、刘延新：《汉语中的满语借词概述》，《满族研究》1996年第1期，第69页

53) 杨锡春：《满族风俗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54) 刘厚生：《红楼与满语言文化刍议》，《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69页。

域为主的文化特征，这一文化迁移现象既是汉族传统文化被异化的表征，也是满汉民族互相融合的历史见证。

3. “新型关东文化”：东北地区的移民文化特征

如前所述，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东北区域文化发生了变异，一种新型的具有移民特色的文化形态——“新型关东文化”随之形成。所谓“新型关东文化”，是在汉族移民大量移入东北，中原文化与关东土著文化之间相互冲突、碰撞、吸收、融合之后形成的。这种新型关东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1) 兼收并蓄、宽容大度、绝少排他性

从人口构成来说，东北人口以移民为主，移民大都来自天南海北，他们打破了“原有的宗族血缘关系，不同血缘的移民按照地缘混合杂居，劳动者之间唯有互相照应，共同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⁵⁵⁾才能生存。这样，在长期的开发过程中，当地的满、蒙、朝鲜等少数民族和汉族移民互相交往、互相学习，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大量外来人口的移入使得人们不得不习惯于同各种不同的人群交往，大批离乡背井的移民涌入陌生的土地，他们无法原封不动地移植家乡的文化，不得不接受、学习各种不同的文化⁵⁶⁾。同时，外来的汉族人口大都没有很深的文化积淀，也不固守传统和不受制约，久而久之，铸就了关东文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这种精神豁达通融，往往能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事物，没有狭隘的地域观念，也使东北人养成了不排外、不欺生、热情好客、乐善好施，喜欢交往的群体性格。在近代中国，外来移民(客民)与

55) 马毅、胡凡：《论关东文化》，《延边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38页。

56) 邢正：《探索吉林地域特色的文化精神》，《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第182页。

土著居民之间暴力或非暴力的冲突事件不绝如缕，成为一大社会问题。而在东北社会中，当地土著居民基本上能与山东等省的移民和平相处，并没有发生像其他地区那样的大规模械斗⁵⁷⁾。直到今天，在东北大地上，当地人对山东人、河北人、南方人都乐于容纳，一视同仁，友好相处，没有隔膜之感。这种状况与中原、南方某些地方大不相同。

此外，就生产方式来说，从游牧、渔猎过渡到农业，是人类走过的共同道路。中原很早就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东北地区则不然，东北的农耕社会主要是在移民的作用下，由南向北嵌入的，嵌入的方式又是分散的、自发的。因此，东北的农耕社会是在游牧渔猎社会的包围下逐渐形成的，在许多方面受到游牧渔猎社会的影响。时至今日，在东部山区和西部草原，这种农牧渔猎兼营的特点仍然存在⁵⁸⁾。因此，农业、渔猎、畜牧经济长期并存，渔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互相混杂，彼此融合，使得东北文化的多元性、兼容性、包容性更加突出⁵⁹⁾。

2) 東北社會沒有建立起典型的傳統倫理關係網絡，人們的血緣觀念淡漠，家族性弱化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典型的“乡土社会”，这种社会得以存在和维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传统农业的定居性。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是“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⁶⁰⁾。千百年

57) 参见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75页；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268页。

58) 参见邴正：《当代社会发展与中国东北社会结构的变迁》，马大正：《中国东北边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144页。

59) 刘国平、杨春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视界中的东北地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第143页。

60)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来,这种对乡土的眷恋,弱化了农民摆脱土地羁绊的能力,使他们习惯于生活在血脉相连、彼此相亲的家族文化氛围中,造成了中国乡土社会“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⁶¹⁾。这种变态的迁移实际上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旧秩序,当移民来到新地区后,势必需要重新修复建立这种关系。

但在移民社会中,人们往往以祖籍地缘,而不是以血缘关系进行组合。这是因为,移民在迁移的过程中,往往不是以家族方式,而是以个人或小家庭方式进行的。移民的离乡他适,迫使他们脱离了故乡的那种既限制他们又给他们以精神寄托的家族关系。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不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为了生存,必求互助。这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可以依附的力量就是同一乡贯的人。乡土的自然环境,没有清晰的界限,在意识上也是很模糊的。然而,政治地域区划却可导致人们乡土观念的明晰化⁶²⁾。因此,在移民集中的地方,人们首先就会在乡土观念的旗帜下形成一种各自为政的自我保护机制,这种自我保护机制不是首先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最初它简直可以说是生存机制的自我本能⁶³⁾。于是,在移民群体中,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这就是地缘关系替代了血缘关系,他们由对家族的依附转向了对乡亲的依附,乡音、乡俗、乡土神灵直至乡土建筑都可成为移民集合的纽带,从而显示出强烈的地域性。1918年《东方杂志》上刊载的一篇关于山东“闯关东”苦力的报道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作者写道:

“此等出外之苦力,各有一定之系统,大抵以其所籍之乡里为范围。如其中一人,因事故必须返里时,必选其属于己之系统者,使代理之。其工头即把头,为一村中之有力者。所发命令,为彼等社会所崇奉。其制裁必实行,如有在工作

61)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62) 参见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9~12页

63) 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之地, 发见(现) 罪恶之行为者, 把头必立予制裁, 此人遂不见容于乡里。故彼等社会, 常受严重制裁之支配, 且有多年养成之不文法律, 以维持其秩序焉”⁶⁴⁾。

由此可见, 以“乡里”为范围的组织系统, 在移民社会里, 不但充当着互相相应的角色, 而且还承担着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责。

另一方面, 东北移民社会的建立, 系特殊的灾荒战乱所致, 因此, 当移出地的生存环境稍有改观, 便会发生“移民回流”现象。这种频繁的迁徙流动, 使得乡村的宗法伦理关系的修复和重建非常缓慢。因此, 东北社会与中原及长江流域相比, “不是一个典型的原生型的乡土社会, 而是一个变态的移民社会”⁶⁵⁾。在中原地区, 一个亲属集团往往长期同居共处, 形成了统治一个个村庄的大家族。如山东孔氏, 在曲阜地区生息繁衍了2,500多年。而东北地区则在持续的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的影响下, 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农耕社会的独特结构方式, 东北的血缘关系和家族统治比中原地区要薄弱得多⁶⁶⁾, 没有建立起像关内地区那样典型的传统伦理关系网络。这种社会结构特点, 对东北社会造成了深刻影响。反映在思想观念上, 人们的家族、血缘观念淡化, 受传统的束缚较轻, 易于接受新事物; 反映在经济的发展上, 则造成了创业个体缺少家族、宗族等民间社群的支持。近年来, 中国江南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生机勃勃,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乡村社会传统的组织资源”, 而东北乡村社会的此类资源则不甚丰富, 这自然会对东北乡镇企业的启动和模式选择产生较大的影响⁶⁷⁾。

3) 文化上的进取性与保守性并存

近代以来, 关内人民“闯关东”⁶⁸⁾者日益增多。一个“闯”字, 说明这是犯禁越

64) 高劳: 《山东之苦力》, 《东方杂志》第15卷第7号, 1918年, 第21页。

65) 田毅鹏: 《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 《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 第189页。

66) 邴正: 《振兴东北与振兴东北文化》, 《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5期, 第136~137页。

67) 田毅鹏: 《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 《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 第189页。

68) “闯关东是关内人口向东北移民的俗称

轨的行为，同时也昭示了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一种群体性的壮举。虽然历史上踏上“闯关东”路途的大多是当地为生活所迫的农民，但他们无疑是勇于开拓新生活的观念上行动上的强者。他们背井离乡，在东北这个地旷人稀、满目荒凉的世界里，他们忍受着艰苦的自然环境的考验、难耐的孤独寂寞，披荆斩棘，风餐露宿，在千古荒原和林海雪原中开拓垦殖，艰苦创业，把东北从一个半游牧半渔猎的社会开发成为一个农业社会。作为全国粮仓的东北，是移民们闯出来的⁶⁹⁾。艰苦的客观环境，逐渐培养和衍生出移民群体所共有的性格心理和文化意识。这就是：对生存的渴望，勇敢、坚韧的意志以及冒险开拓的意识。因此，在东北的地域文化中，在东北人的性格成分中，已经渗透进“齐鲁文化”和“燕赵文化”的成分，从而形成了近代东北人勇敢坚强、奋发进取的性格。这种精神在近代东北的开发建设及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都有所体现。

勇敢进取精神是“闯关东”的先民们留给东北人的宝贵财富，但在近代东北独特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异。清末民国以来向东北移民的数量虽然大大地增加了，但与关内狭乡之地相比，东北仍是地广人稀，加上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农业丰年有余。迁徙到此的移民，虽不会有大的发展，但凭借大自然慷慨丰厚的馈赠，维持生计却也不成问题。这对于那些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贫苦农民来讲，很容易产生满足感。而寒冷的气候，又使得东北乡土社会形成了漫长的“猫冬文化”⁷⁰⁾。东北地区，冬季漫长，无霜期仅120天左右，户外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除了春秋两季较为忙碌外，东北人较其他地域的人更为悠闲，常一年闲半年。优越的自然条件养懒了东北人，当年的移民在新的家园定居下来后，经过岁月浪花的淘洗，今天，在这些移民的后代身上，先祖们创业时的那股闯劲和冒险开拓的精神已经逐渐淡薄了。在生存压力不大的条件下，东北人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往往是被动的、同时也是依赖的，因

69) 郝正：《振兴东北与振兴东北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5期，第133页。

70) 田毅鹏：《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第188页。

此所形成的文化必然是封闭的、保守的。表现出一种懒散的生活方式，小富即安的心态比较突出，社会惰性也较强，与中国南方发达省份在地域文化上形成强烈反差。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多少改观。东北人仍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大钱挣不来，小钱又不愿去赚，不少人满足于“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现状，宁可在家受穷，也很少外出打工，结果是，“流动者的后代大都缺乏流动”⁷¹⁾。

保守、封闭的观念一度束缚了东北人的创造力，也抑制了东北人的精神。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东北落伍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东北地区部分产业工人下岗失业，黑土地上生产的粮食大量积压，出现了全国瞩目的两次“东北现象”⁷²⁾。造成“东北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如体制、机制等因素)，但地域文化的保守性无疑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如何“振兴东北”？笔者以为，首要的是对东北文化进行重新塑造，实现地域文化的转型。激活“闯”的基因，剔除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保守观念，让坚忍不拔、一往无前、敢闯、敢于开发的“闯关东”精神重新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和人生信条，为振兴东北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由于移民的大量进入，东北区域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北地区的发展逐渐地接近内地文化水平，这一历史功绩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汉族移民，但汉族移民作为边疆地区社会变迁历史合力中的一支分力，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同时，东北地区对中原文化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优化整合，形成了既不同于关东，又不与中原地区一致的东北地区特有的文化，使得东北地区的文化由民族性特色到地方性特色的转化十分明显。此

71) 邢正：《振兴东北与振兴东北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5期，第137页。

72) 20世纪90年代初，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作为国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出现工业效益下滑、工业生产步履维艰的困境，当时被称为“东北现象”；曾是国重要粮仓的东北三省，近年来，特别是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出现了传统优势农产品大量积压、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经济效益提高不大较为尖锐的问题，被称为“新东北现象”。参见新望：《“新东北现象”与“中部塌陷”》，《中国改革》2003年第9期。

后，满汉之间的一致性愈益增多，旧有的显著差别陆续减少。正如史料所云：“东北地区因汉民寄居者日众，是以久而自化，满洲人亦皆用汉语，尽用汉字，驯至互相同化，互通婚姻，文化日进，畛域除焉”⁷³⁾，大大促进了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得到增强，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투고일: 2010년 9월 5일, 심사개시일: 2010년 9월 25일, 게재확정일: 2010년 10월 15일

73) 杨学琛：《略论清代满汉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满族史研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年版，22页

參考文獻

- 景体涓等, 2000, 「试论东北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双语现象」『松辽学刊』~2000年 第6期
- 傅乐焕, 1984, 「关于清代满族的几个问题」『辽史丛考』, 中华书局
- 徐世昌, 1989, 『东三省政略』, 长白丛书本, 吉林文史出版社
- 王日根, 1996, 『乡土之链: 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 天津人民出版社
- 田毅鹏, 2002, 「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 第6期
- 田毅鹏, 2002, 「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 第6期,
- 曹树基, 1997, 『中国移民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 池子华, 2001, 『中国流民史·近代卷』, 安徽人民出版社
- 刘国平·杨春风, 2003, 「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视界中的东北地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 第5期
- 刘厚生, 2001, 「红楼与满语言文化刍议」『清史研究』~2001年 第4期
- 新望, 2003, 「新东北现象”与“中部塌陷」『中国改革』~2003年 第9期
- 池子华, 1996, 『中国近代流民』, 浙江人民出版社
- 邴正, 2003, 『当代社会发展与中国东北社会结构的变迁』,
- 韩光辉, 1996, 『北京历史人口地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璇如, 1983, 「清初封禁与招民开垦」『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 第1期
- 许皓光·刘延新, 1996, 「汉语中的满语借词概述」『满族研究』~1996年 第1期
- 费孝通, 2002, 『乡土中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赵中学, 1999, 『近世东三省研究论文集』,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 邴正, 2002, 「探索吉林地域特色的文化精神」『社会科学战线』, 2002年 第6期
- 邴正, 2004, 「振兴东北与振兴东北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 第5期
- 陈孔立, 1990, 『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 马大正, 2003, 『中国东北边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文摘要 ■

近代以来，关内移民大批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促使东北区域文化发生了变异。一方面，汉族文化在东北少数民族中传播，被土著民族所接受，以满族为主体的土著文化逐渐被同化；另一方面，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出现了变异。这样，东北文化开始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类别，使得原来以“民族”为主的文化特征开始向以“地方”为主的文化特征转化，并在各自原有民族特性的基础上进行自觉的融合和优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既不完全同于关东，又不与中原地区一致的东北地区特有的富于移民特色的文化形态——“新型关东文化”，这使得东北地区的文化由民族性特色到地方性特色的转化十分明显。

www.kci.go.kr

关键词：近代、关内移民、区域文化、变异、民族性、地方性